

最近，看到一些材料，其中有的说法，值得研究。由此引出的话，有的是老话，有的是新想起来的，之间往往没有什么联系。

重申学科性质

所以说是“重申”，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已经说过。

张静如 著

張靜如文集

第二卷

说法，在今天研究中共历史的圈子内仍然存在。本来谁爱怎样认识党的自由，别人不能也不必强迫。问题是这些说法不科学，所以还必须受，那是另一回事。

比如，说是“政治性非常强的历史学科”，就把学科性质和学科

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一般说来这种根本属性只有一

海天出版社

张静如 著

張靜如文集

中石題



海天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

(讲授提纲)

第一讲 导 言

(一)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对象

1.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战胜各种敌对思想、错误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核心。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对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

2.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科学地阐明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党和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对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对于向干部和青年一代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和思想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

3.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第一,要详细占有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综合分析,避免主观臆断。

第二,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考察,要

在毛泽东思想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对比中研究。

第三，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同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斗争过程结合起来研究。

第四，要把毛泽东思想史看作是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发展史，不能离开集体创造单纯叙述个人的思想发展，但也应该肯定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并予以科学的说明和评价。

（二）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1.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的一种思想体系，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而结出的硕果。但是，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课题，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泽东思想带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概念，其所包含的内容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这些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又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东西。科学理论是对事物本质的抽象概括。它不是正确与错误的混合物，而是总结正反面经验，排除错误，提炼出正确的东西形成的。因此，一切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轨道，不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点，都不能包含在毛泽东思想之内。当然，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已经穷极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真理，它要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曾被以往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原理、判断、结论，失去具体指导意义，甚至再用它指导实践会发生失误；实践发展了，许多过去

不曾碰到过的新课题出现了,需要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的回答。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原理、判断、结论必须根据实践的变化修改,必须以新的理论概括解决新的问题。

3.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科学理论,就是概括起来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所以,离开集体奋斗,就不可能有理论。毛泽东思想既然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它就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集体奋斗。当然,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不可能由全体人民共同进行,而只能在群众的实践创造出来的经验的基础上,由少数人组成的一个领导集团集中概括成理论。所以说,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毛泽东做了主要贡献。也就是说,他的贡献居首位。或者说,如果没有他的贡献,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定型。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才把自己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用毛泽东的名字命名。

(三) 毛泽东思想产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1.20世纪的中国出现毛泽东思想,并对改造中国社会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思想的出现,首先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摆脱落后、贫困,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七十多年里,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曾倾心致力于探索社会改革的途径。他们向西方和日本学习,提出多种改革中国社会的方案,并有选择地在实践中进行尝试。虽然,这些方案中有着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它们都没有超出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社会无法实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畴,所以没有成功的可能。

第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的破产,迫使革命者重新探索救国之道。既然世界上千差万别的学说归根结底都分属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思想体系,那么,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革命者心目中破产的时候,他们只得向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求教。同时,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过程中,作为追随者的无产阶级日益成长壮大。到五四运动时期,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迫

切要求有代表自己阶级利益，指导自己阶级进行斗争的革命理论。因此，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要让位给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要使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发生实际作用，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作为世界近代工人运动经验总结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来源于实践，但当运用它的原理去指导正在发展着的具有不同特点的各国工人运动时候，如果离开那个国家、那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注定会出现偏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在这个国家进行革命，必然会出现许多马克思、列宁以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没有遇到过的特殊的复杂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外国经验不行，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2.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客观条件。

第一，伟大的革命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个在世界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革命。它要在东方的大国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典型国度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因而其每一胜利必然给予世界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发生重大影响。这个伟大的革命，是不可能轻易取胜的，而必须经过长时期的、极其残酷复杂而曲折的斗争，这个斗争必然要积累起来无数丰富的经验。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但继承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传统，而且把民主主义革命中积累起来的人民斗争经验，经过加工，转化为自身的经验。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多种阶级矛盾的并存和阶级阵线的多变，以及敌对思潮的挑战和错误思想的干扰。在处理和解决难度很大的问题过程中，随时都会积累起来正面和反面的经验。

第二，对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正反面经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加以总结，当然要形成适合本国情况的具有独创性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第三，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科学不发达等条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任务相当艰巨。所以，

这不但要有充足的客观条件,而且还要具备极其优越的主观条件。这就是说,进行这种总结的人,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并能够把它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卓越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具备着这样的条件,特别是毛泽东。他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高度的文化修养,不但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概括成理论,而且能够提炼出中国悠久文化遗产中最精华的东西,充实自己的思想,并转化为理论;他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最大的理论勇气,敢于进行大胆的创新,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情况的新原理和新结论。

第二讲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一)党的创建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始结合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十月革命之后真正开始的。

第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个革命向全世界宣告: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工农才能当家做主;只有打倒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才能够得到解放;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这使在历次斗争中屡遭失败,陷入怀疑、彷徨的苦闷境地的中国先进分子,感到特别亲切。他们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找到唯一能够解救中国人民厄运的科学真理。第一个把十月革命的真相和马克思主义的真义告诉给中国人民的,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李大钊。他的《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标志着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代表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后世界局势的认识,以及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俄国革命经验来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的倾向。李大钊本人也成为第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第二,这之后到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初步传播。在此期间,李大钊发表几十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是:继续强调十月革命的意义,指出人类将向“世界大同”迈进;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本质,特别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提出用“直接行动”的办法达到社会

制度的根本改造；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到工人农民中开展工作；阐明人生之真义，提倡“努进”人生观，把握“现在”，为“将来”奋斗。这些，对于提高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觉悟，起了重要作用。

2.马克思主义能够立足于中国思想界，在部分先进分子思想中扎根，经历了一个比较鉴别和斗争的过程。

第一，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所起的解放思想作用的后果，五四运动对于探索真理的促进，并不是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和传播。事实上，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标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由于缺乏知识，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许多冒牌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特别是由于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而产生的鄙视暴力的观念作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相当不少的人，对那些宣扬互助、主张和平改造的学说更感兴趣，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却难于接受。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手段改造社会的李大钊，也提倡用互助论补充马克思主义。这充分说明，在当时，一个人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确实非常不容易。

第二，从五四运动到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出现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两方面较量而确立自身在中国思想界的一定地位。一个是同公开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这就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一个是同空想社会主义的较量。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胡适等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给予一定打击，但部分先进分子头脑中更深更牢的避免暴力的观念并没有被打破。他们厌恶反动统治，主张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当然不同意胡适的观点。可是，他们并不提倡用暴力手段对付反动统治，而热心搞新村、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希望以此种手段改变社会制度。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质上仍是改良主义，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人们由此得到启示，认识到任何改良都行不通，唯一道路是效法十月革命。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革命知识分子放弃对民主主义的信仰，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一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队伍。继李大钊之后，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杨匏安、王尽美、张闻

天等,为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阵地做出极大的贡献。

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个硕果,是产生中国共产党,并开始自身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

第一,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从1920年8月到1921年初,以上海为起点,在几个大城市里和在法国、日本留学生中,相继建立被后人称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种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胚胎或雏形。它的出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开始。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这主要表现在: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有关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加强对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情况和各国工人运动情况的介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加强在工人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新阶段。它的基本道理不仅以理论形态为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掌握,而且还以常识形态为部分先进工作者所理解。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不能不引起敌对思潮的攻击。其中,以研究系的梁启超、陈东荪等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最为。前者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的无政府主义则把共产主义变成永无可能实现的幻想。这两种学说的宣传及其宣传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起着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作用。于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势不可免。这一斗争的结局,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为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和思想的基础。

第三,1921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提出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的奋斗目标。这就破天荒第一次正式宣布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具有很大的意义。从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到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整整三个年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从无到有,并在同各种敌对思潮、错误思想的斗争中赢得胜利,终于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

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家也没有掌握政权。因此，提出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虽然从宏观的角度上看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在现时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却脱离了实际。要革命，就必须首先要弄清楚革谁的命。既然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残酷压榨和统治中国人民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特别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军阀和官僚，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先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对这个问题不能正确认识，革命就不能起步。党的一大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说明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还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经过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并不是资产阶级政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在一起，其实是他们对当时的政权性质弄不清楚。而他们所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既少且理解不深刻，在同实际对不上号的情况下，出于对十月革命道路的信任，自然只好采用现成的办法，按照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样式制定自己的纲领，规范自己的行动。

第四，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规定了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它解决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解决过的问题，第一次为中国人民指明争取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这说明，党在中国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上，即现阶段革命对象和任务问题上、革命性质问题上，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党的二大所以能够有如此重大突破，除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外，是因为党的一大之后革命实践的发展给党检验自己的认识提供了客观基础。党只有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的组成部分，党的二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开端而载入史册。

4. 综观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部过程，理论准备是不足的。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很短，由于已经很成熟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革命者把主要精力转向实际运动，因此参加党的创建工作的共产主义者，大多数人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列宁的主要著作，更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理论研究。不仅如此，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急于希望能在短时间内使实际运动大见成效，还由于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全党多数的情况下

过分强调实际斗争锻炼,因而就在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没有能在党成立后及时得到补救。

(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从党的二大到1926年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和研究,较之党成立前,有很大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全党有更多的党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而部分有较高知识的领导干部,在理论的研究上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面得到扩大,报刊上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增多。这两方面,在当时的《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农民》、《新时代》、《政治周报》、《政治生活》、《人民周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有极明显的反映。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李达、李汉俊、周恩来、刘少奇、向警予、赵世炎、任弼时、张太雷等,都为之做出不同的贡献。

2.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研究的普及和深入,势必引起多方面的挑战。党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做出科学回答,才能战胜敌对思潮的攻击,纠正党内外错误认识,才能在中国社会上存在和发展。

第一,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因而实践的发展必然提出问题,要求理论作出回答。党成立后,立即投入实际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从国共合作的建立,到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随时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结蒂都涉及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涉及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只有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并准确判断形势变化的趋势,制定恰当的对策,才能引导革命向胜利的轨道上发展。

第二,党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难题时,难免出现错误认识,这就更增加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二七罢工失败后,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思想开始走下坡路。他发展了党的三大的某些错误观点,把资产阶级当作民主革命动力的主体,认定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无产阶级不必考虑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应该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这种错误观点,主要反映在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五卅运动后,陈独秀的思想曾一度有所回升,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做了一

些有益的分析。但是，他思想中对人民力量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使一度萌发出来的正确认识在遇到实际困难和挫折时迅速变更。1925年内，国民党新老右派的轮番进攻，使陈独秀产生对继续加强工农群众力量的怀疑，害怕因此而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弄僵。所以，在1926年上半年，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陈独秀连续实行妥协退让政策，放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致使国民党右派势力大大加强。《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等文章，反映陈独秀在这个时候的右倾错误认识。显然，要克服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党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

第三，党在同国民党建立合作过程中，必须科学地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从事革命屡遭失败，重要原因是他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三民主义学说曾经在动员人民反对清政府统治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它的弱点也很明显。它既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又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因而无法指导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要使三民主义呈现新的面貌，成为统一战线的纲领，并在实践中坚持，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做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第四，党在发展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遇到国民党右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攻击。1925年6、7月间，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连续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反动小册子。戴季陶主义的中心是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据此，他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反对国共合作，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戴季陶提出的问题，涉及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最尖锐的是国民革命究竟应该由谁领导的问题。

第五，党在推进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遇到的表现最为猖獗的反动思潮是以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为首的国家主义派。他们创立主办的《醒狮》，是这派观点的集中表现。该刊在理论上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幌子，宣扬“全民政治”、“全民革命”，反对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涉及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尤其是要不要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问题。

（三）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

1. 自党的二大明确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对象和任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开始结合起来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沿着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轨道逐步前进。党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革命和现时斗争经验的总结,通过对于中国社会性质、政治经济现状、各阶级状况及其关系、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分析,从1925年初到1926年初,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而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别标志着这一提出过程的开端和结束。

2. 从党的二大到四大,党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如下的程度。

第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党的二大开始有较为正确的认识,随后在党的文件中,又不断丰富和发展这种认识。到党的四大时,至少有以下几点:

(1) 中国是各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半殖民地;(2) 中国社会仍停留在半封建经济基础上;(3) 政权由封建的军阀官僚所把持;(4)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大战期间得到一定发展,但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阻挠;

(5)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工农群众的生活日益悲惨。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二大明确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党的三大则正式使用国民革命的概念,并指出它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党的四大的解释更加明确,把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区分开,指出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但文件中未能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性质上亦有别于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这个问题自党的二大明确后,党的文件多次从不同角度论述过这方面的问题。到党的四大,把大商业买办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严格区别开来,指出前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反革命派。

第四,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1) 党的二大没有明确区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部分,只笼统称之为幼稚的资产阶级。党的三大虽然在个别地方使用过少数大商人和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概念,但总体上仍对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不加区分,并把买办阶级的特性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特性。党的四大区分了大买办阶级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但却认定后者“还在由买办官

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运动”。

(2)从党的二大到四大，都认为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3)党的二大、三大都一般地指明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党的四大则得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同盟者的结论。(4)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认识，从党的二大到四大基本上都是正确的。问题是党的四大前，对工人运动力量的估计太低，而党的四大则指出它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新起的生力军”。

第五，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对此，只有到党的四大才明确，其已经认识到的，有以下几点：(1)无产阶级不能孤军作战，必须团结同盟者；

(2)无产阶级以独立地位参加民族运动，并有自己的目的；(3)无产阶级必须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权；(4)无产阶级必须有坚固的独立的阶级组织；(5)资产阶级力图使无产阶级的组织变成民族运动的附属品。

第六，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最终目的，从党的一大起就是明确的。但是，对于民主革命的结局问题，党的二大把两种不同结局当作一个混合物提出来，说明认识上很不清楚。党的三大提出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的目的，这在认识上有所前进。党的四大则在此基础上提出避免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

3. 到党的四大，党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有许多严重不足之处。如它没有明确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没有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又如它没有分清农民中的不同阶级、阶层，更没有提出农民土地问题。但不能因此说它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提出过程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的雏形或萌芽。因此，所谓这一思想的提出，就是说党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已经具备决定这一理论特性的最根本的要素的一定成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包含丰富的内容，而决定其特性的最本质的要素则是革命领导权和革命目的。所以，衡量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是否提出，应该以是否对革命领导权和革命目的有大致正确的认识为标准。至于归属第二层次的问题，如争夺领导权问题，对农民阶级分析问题和土地问题，以及武装斗争问题等，则不应作为衡量的条件。再者，大革命时期，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过程有较明显的渐进性，往往难于以一次会议或一篇文章当作一个较系统的认识的标志，所

以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看成一个过程,更符合实际。既然是一个过程,当然就有开始和结束,而且对其开始的要求一定要比结束的要求低一些。根据以上标准衡量,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又没有肯定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党的四大,作为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过程的开端,应该说是够格的。

4. 党的四大之后举行的党的会议和发布的文件,特别是1925年10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文件,使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得到充实。这主要是:指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农民土地问题和“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

5. 党的四大之后,党在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李大钊、邓中夏、周恩来、刘少奇、彭湃、张太雷、赵世炎、恽代英、萧楚女、向警予等继续在实际斗争中,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特别是经过五卅运动,经过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他们进一步总结斗争经验,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革命发展规律,丰富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

6. 毛泽东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做出杰出的贡献。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提出过程结束的标志。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使党已有的认识得到升华。其中主要是:

第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毛泽东的贡献在于指出现阶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说明前者要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

第二,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的贡献在于研究如何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民主革命领导者的条件,即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和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克服党的四大对农民的分析的弱点,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民做了具体的分析,指出无产阶级要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关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深刻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指出无产阶级在与之联合中必须时刻提防其对革命阵线的扰乱。只有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有正确认识,才能真正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第三,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做出科学概括。

7. 从1925年初到1926年初,党完成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过程。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论,因此提出它的基本思想也就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已经萌芽。为什么只能称为萌芽呢?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党要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才叫做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这时,虽然已经初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独立解决问题的程度,特别是还没有找到一条能够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理论体系,所以它的形成必须表现为一种理论形态,而不是一般认识形态。这时,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与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比较,还处于零散而不集中、不严谨的认识形态。它在概念的表述上既不准确也不统一,在认识深度上显得肤浅而不全面,缺乏充分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论证。总之,它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的理论形态。

第三,一种政治学说必须以一定的哲学理论作基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知之甚少,不能自觉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第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要求理论上的成熟、稳定和实践上的运用自如。这时,党的领导人,包括在认识上较为领先的领导人在内,常常并非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得出前后不一致的结论。至于在实践的运用上,更显得不成熟、不得体、不灵活。往往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对实践的判断上却出问题。

(四)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过程的中断

1. 毛泽东思想萌芽后,曾经在一个短暂时间内,对革命实践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北伐战争进程中,武装斗争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是党的正确理论指导的结果。

2. 毛泽东思想萌芽后,曾经由于一些同志的努力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民问题做了系统研究,使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得到发展,为后来彻底解决农民问题,找到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形成毛泽东思想提供了良好基础。此外,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邓中夏的

《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等文章，都为加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理论性做出贡献。

3. 就整个历史进程说，1926年12月党中央特别会议，中断了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轨道上的探索。在陈独秀右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错误估计形势，错误分析造成国共合作危机的原因，错误判断国民党领袖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的阶级属性及其动向，执行错误的以至投降的政策，终于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第三讲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一) 大革命失败后，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取得的成就和失误

1.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实践向党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中国社会性质是否改变？第二，中国革命性质是否改变？第三，怎样正确看待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革命动力，制定正确政策？第四，如何分析形势，决定党的当前任务？第五，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总之，集中一点，就是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

2. 八七会议确定继续坚持革命的大方向。

第一，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必须继续坚持进行资产阶级政权革命，从而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8月12日《中央通告》第一号说，八七会议认为：“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之中是唯一能引导民权革命到底的阶级。现在农民的土地革命及农会的政权革命，既是民权革命最高形式的表演，无产阶级自然应当和农民群众建立真正的斗争同盟，领导他们去打倒土地革命之一切障碍：新旧军阀，豪绅地主，反动的资产阶级及虚伪的‘左派’。”八七会议对要不要革命这个在革命失败后的高层次的问题给予坚定的回答，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第二，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国共合作、农民运动、军事及组织问题